

费正清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认识*

张德明

提 要: 费正清曾在华工作, 亲身体验过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方方面面, 在其之后回忆录及著作中对国统区进行了深刻解读。他对国民党在战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政策给予了批评, 对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病表达了不满。他与国民党官员、知识分子及共产党人士进行广泛接触, 并有不同的评价, 特别是对蒋介石及其《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批判。他还对国统区的社会生活进行描写, 叙述社会各阶层的境遇。费正清对抗战时期的国统区观察, 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真实境况, 也影响了其以后对国共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 费正清 抗战 国统区 国民党 知识分子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曾多次来到中国, 被誉为“中国通”。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著作颇丰, 除《心系中国: 五十年回忆录》外, 还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 传统与变迁》《中国新史》等一系列著作。在这些著作中, 他对中国抗战进行了考察。目前学界对其关于中共抗战的论述研究较多, 但对其关于战时国统区的观察则研究薄弱。为此, 本文将对费正清关于战时国统区内国民党的统治、重要人物及社会生活的评论进行研究, 以期从外国人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抗战。

一 对国民党统治的评价

1932—1935年, 费正清首次来华, 在清华大学进修、任教。1942年9月, 费正清以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身份再次来华, 同时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驻华代表及美国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主任, 实际上他还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驻华情报员, 主要进行中美文化交流及对日情报搜集工作, 直到1943年12月回国。回国后, 他根据自己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亲身经历, 在回忆录等有关中国著作中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全方位评价, 其中以批评居多。

1937年, 抗战全面爆发, 对国民政府造成了严重影响。对此, 费正清除了介绍中国学校与工厂内迁外, 还认为沿海城市是国民政府根基所在, 内迁则是致命伤。“国民政府本以对外贸易为立国根本, 但战事的发展迫使它迁往内地, 日渐与外界隔绝, 海关税收也被日本截断。这时它才开始领教内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蒋介石正确地估计到, 日本的疯狂侵略早晚会使其他国家卷入战争, 中国会得到它们的援助, 战争会成为双方耐力的竞赛。”^① 对于中日战事, 他指出: “国民党政府从未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方地方上占支配地位, 因此无力阻止这种扩张。它的现代化部队忙于阻挡日本在湖南稻米之乡这类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 其所受训练是进行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蒋介石的军队还受到中国军事传统的限制, 严重脱离人民。”^② 他还肯定国民政府坚持抵抗日本的精神, 认为这赢得了世界的同情。对于美国在1941年后才开始对华大规模援助, 他认为为时已晚, 指出, 美国的战时援助很晚才到达这个危机四伏的政府, 不但没能起到医疗战争创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 16KZD021) 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 费正清著, 张沛等译 《中国: 传统与变迁》, 吉林出版集团, 2013年, 第423页。

② [美] 费正清著, 张理京译 《美国与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 第272页。

伤的效果，反而成了国民政府赖以骄矜自恃的资本。^①

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施政表现，费正清也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蒋介石及其政权之顽固保守和在南京的时候一模一样。他们觉得战争只是军事单位的事。大学教育是为将来用的，因此用不着动员学生为战争努力，只要发给奖学金，让他们学习就行了。识字运动当然不去提倡，公共卫生服务根本不到农村去。旧中国统治阶层的人在农村中依然离开群众远远的。”他还指出，重庆政府在中国西部尽力叫地方军阀听话，避免搞乱地主在农村建立的社会秩序。国民党政权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降为深山沟里的逃难政府。四川省和法国或德国一样大，是可以变成一个打退日本、收复中国的根据地的。但是历史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对于革命太没有信心，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②他根据自身的实地体验，对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宣传的美好形象深表怀疑，并于1943年7月称“中国向西方宣传的乐观景象是极其有害的，它不过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粉饰太平的衍生物。他们只是应对当前的压力，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维护政府的脸面，在中国这是一个传统。没有一位官员公然宣称在他的部门存在失败和过失，官员们互相嫉妒和竞争，生怕落后于他人，因为如果承认失败、过失，则会遭到对手的攻击。同样，任何一届政府也不会像美国那样指出国内存在的弊病，因为政府或者说凌驾其上的领导人会被认为是所有此类弊病的总负责人。”^③他的此种认识也和当时很多美国在华军事官员的看法类似，即国民政府的弊病在战时并不会改变。

对国民党在战时进行的政治改革，费正清也给予关注。如在地方政府管理上，国民党1939年颁布法令推行新县制改革。费正清对该改革具体内容描述称“各户可按社团性质比较灵活地组成甲和保。村镇要变成加入社团组织的法人，能够施行其自身的地方行政工作。每保应集会选出二名代表，这两名代表又参加村镇的集会，协助从其中选出的村镇政府首脑进行工作。”^④对于该改革效果，他认为只是名义上实行，指出“地方政府于1939年实行‘新县制’以振兴县级经济和福利，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只是恢复了古老的保甲监视制度，这对于维持地方秩序多少有些用处。政府宣传说保长由村级选举确定，因此有‘自治’性质，但实际上并无记录证明当时内地农村举行过选举活动。”^⑤国民政府于1938年设立国民参政会，费正清在重庆出席过该会，故有所观察。他认为国民参政会是可发表自由意见的传声筒，可以动员自由主义者参加战争，但也是政府敷衍公众对成立代议制政府的要求，其成员基本上是各界的头面人物，且这个机构只有建议权，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给它答复。^⑥他还指出“人们都希望看到这个代议制政府能够涉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愿望没能变成现实这些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机构，只是偶而参与一些公共关系事务。”^⑦

对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费正清则颇有微词。他指出“尽管国民政府控制着出产大量粮食、食物能够自给的农业地区，但它未能用征收地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入。相反，它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政策基本没有触动关系民生的农村经济，但却把为政府

① 参见[美]费正清等著，黎鸣等译《东亚：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35页。

② 参见[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25—226页。

③ [美]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52页。

④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251页。

⑤ [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费正清中国史》，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第472—473页。

⑥ 参见[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24页。

⑦ [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4页。

工作的城市工薪阶层日益推进了通货膨胀的绞肉机，而他们是当时中国惟一的现代化因素。”^①他认为国民政府对于抗战的应变措施，只是短期的变通办法，无法增强国民对未来的希望，并指出重庆政府当时还能靠收取田赋来维持政府运转，工业上则有几个兵工厂在生产以支持抗日。^②

费正清对国民政府在战时对农民的政策，特别是实行的苛捐杂税有详细描述。他认为“国民党在对待农民方面也一点都不高明。虽然通货膨胀开始时因为抬高了农作物的价格，使农产品生产者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这点好处很快就被苛捐杂税抵消了。地方政府派下千百种名目繁多的税款，主要为了维持他们的行政机关和填满私人的荷包……下级收税官员想得出什么名目，就收什么税。”^③他还对国民政府对农民征粮进行了叙述，称国民政府在战时授权军队可以就地征粮，但在1942—1943年河南灾荒中，军队不顾粮食短缺，仍然对农民继续横征暴敛，导致饥民打死官兵事件发生。^④费正清认为，国民党在战时不敢真正发动民众抗战。1946年，他在美国发表文章称，在战争时期，国民党竭力避免真正的民众动员，他们同时也反对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因为这将很可能形成许多民众组织而使他们难以对付。与共产党相反，国民党在战争中不能组织或是武装农民来作民众的自卫与抵抗，因为国民党并没有改革农民生活的计划，无法得到农民的拥护，一旦农民们武装以后，国民党将无力控制他们。^⑤正是看到国民党在战时对农民问题的忽视，未能切实改变农民境况，在经过比较后，他对中共农民政策的成功更加赞赏。

费正清对国民党成立的军统、三青团等各种团体在战时的活动也有观察。他认为国民党设立的各种全国性组织带有组织领导与监督控制的两面性，如三青团在一些校园被用来开展活动，而在另一些校园则用来阻止某些活动开展。事实上，三青团经常进行跟踪、监视活动，因此西方称其为间谍组织。^⑥他还指出“三民主义青年团建成了一套和国民党平行的金字塔式组织。但随着团员年龄的老化，它逐渐成为国民党的竞争对手，而这个团体又提不出任何新的思想，最终只能被国民党回收。”^⑦对于军统镇压民主运动的活动，他更是颇有批评，认为他们力图通过镇压反对意见来达成表面的统一，然而未能如愿；其独裁统治与恐吓威胁的方式毁掉了政府在上层爱国分子心中的合法性。^⑧他对国民党在战时对知识分子在内的进步力量的压制则分析称“国民党和政府的秘密警察千方百计努力保持现状，越来越把自由主义者看成潜在的颠覆分子，因此要牢牢看住他们。他们设立许多训练中心，把教授们分批集中起来，要他们忠于三民主义，结果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敌对情绪。用强硬办法对待学生、出版家以及其他似是而非的敌人，一步一步扩大了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而政府还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⑨费正清本人在重庆也遭到过军统特务的监视，故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更加深恶痛绝。

对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费正清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国民政府和四川、云南以及广西各省军阀当权者之间糟糕的关系，使它花去不少力气去镇压或对抗各种派系。因此重庆要想扩大地方自治，也十分困难。云南省政府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大部分军队驻在省内，直到战

① [美] 费正清著，张沛等译 《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25页。

② 参见 John K.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13.

③ [美]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227页。

④ John K.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p. 314.

⑤ 参见李嘉翻译 《费正清论中国时局真相》，《文萃》1946年第50期，第31页。

⑥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53页。

⑦ [美] 费正清著，张沛等译 《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24页。

⑧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77页。

⑨ [美]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226页。

争结束以后才改变这种做法。^①他认为国民政府高层在战时仍热衷于争夺权力,因派系斗争激烈,从国家利益考虑完成一件事情几乎不可能。他还指出中国政治中的人情关系“人们并不关心国家政策问题,他们需要的是习惯上的私人关系纽带。事实上,首要问题是生存,而政治上的生存需要人际关系的帮助。西方人眼中的政治问题涉及政体、国家以及民族等方面,而这些在中国都被看作次要的。它们是奢侈品。”^②对国民政府内部势力颇大,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CC系,他也给予否定评价“CC系统的兴趣只在于抓权和强化控制,保持权力,他们没有进行重大改革的能力。他们手下的人是一批唯唯诺诺的小人,都不是心怀大志的人,对他们的职责也没有多少热情。”^③

在战时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上,费正清因与清华大学(当时为西南联大)教授们非常熟悉,故关注较多。他认为国民政府试图控制教育来为政治服务,引起教师的质疑,故曾指出: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是迈向教育政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遭到了那些对国民党全无好感的自由主义教育者的强烈不满。目前学术界的情况是,蒋介石试图作出努力来巩固政权,但他的执政思维过于拙劣,结果只能导致学术界与其更加疏远。^④他进一步分析政府与教授之间的冲突称“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实行严格管理,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已掌控着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政策。尽管如此,他在清华大学遇到了资深留美归国教授们的坚决反对。这是一场持久的斗争,这是拥有权力和财政支持的国民党和教育部门与决心保护美国传统的自由教学方式的教员之间的较量。”^⑤他还分析国民党和教育部采取的教育救济措施,即“迫使年轻的教授们加入国民党,对那些肯于这样做的,重庆方面给予特殊的恩惠和照顾。政府给西南联大的经费,是按照招生数量,而不考虑清华(以致整个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在昆明的省立云南大学经费要充裕得多,而西南联大三校的教授却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⑥费正清对国民党的战时教育政策非常不满但又无奈,只能呼吁美国给予教师们援助。

对于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费正清同样有所观察。他分析指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国民党很快就发现,共产党在战时社会剧变中会得到更大的利益,特别是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国民党开始在其控制区内压制这种势头,派去封锁西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军队达20余万人。两党统一战线只是一面贴上‘统一’标签的墙纸,墙背后掩盖不住的事实是两个拥有武装的集权政党互相争夺最高权力”^⑦。虽然国共在抗战中再次合作,但国民党仍对共产党进行提防,他以自己生活的重庆为例叙述称“总的说来,在重庆的中共还是孤立的一小批人,处于劣势,谈不上构成什么威胁。坐落在城外小山顶上的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围着铁丝网,有重兵把守,这是对他们城内备受监视的办事处的一种补偿。那里有一架电台同延安保持着联系,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外国人,一律不准入内——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必须带有的痕迹。”^⑧此外,他还指出周恩来在重庆居住的周公馆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这表明国民党在重庆仍然将共产党视为威胁,并采取各种防范措施。

通过在抗战中的经历,费正清改变了首次来华期间对国民政府的看法,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① 参见[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227页。

② [美]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55页。

③ [美]费正清著,赵复三译《中国之行》,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④ 参见[美]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50页。

⑤ [美]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00页。

⑥ [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第243页。

⑦ [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24页。

⑧ [美]费正清著,陆延译《战时国共两党》,《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10期。

及无能表现表示了失望。他在回忆录中的一章标题即为“1943年，蒋介石开始丧失人心的一年。”如1943年8月，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感情上，它已失去广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并且没有足够的有识之士来挽救残局，因此，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①他还对中国未来局势进行了精准预判，认为国民政府前景黯淡，不能应付各种社会问题。他在1943年11月9日的信中说“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中国在战后极有可能会爆发严重的内部政治动荡，因为如今的政府使其陷入了‘原始的法西斯主义’情形中。他们只是一个政治小团体，却顽固地牢牢抓住权力，并希望借助工业化来成为永久巩固其统治权力的工具。而他们的思想又过于保守，无法保持与时俱进。”^②在对国民党失望的同时，他还对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寄予了希望，并称：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左派似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其心情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与大使馆和新闻出版界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国民党不再信任，对自由主义者的潜力不再抱有幻想，对当地的左派却表示欣赏。^③1944年，他回到华盛顿后仍然对国民党表达不满，称“中国的社会现实已经孕育着一场革命风暴。无论是CC集团的宣传，还是戴笠的秘密警察的恫吓，都不可能阻止它爆发。农民要求解放的真理，以及二十年前‘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理想，充满爱国主义的精神和活力。蒋介石却拿不出任何可以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④费正清在战时对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判断，可谓犀利精准，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二 对国统区人物的观察

费正清在华期间，与中国的官员、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共产党人等都有所接触，并在自己回忆录及著作中给予了描写及评价，其中对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官员的描写尤其深刻。

1942—1943年期间，费正清曾到迁到大后方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及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等机构访问，与这些大学、研究机构的教师们有了广泛接触，并在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如1942年在昆明时，他与当时在西南联大的梅贻琦、金岳霖、陈岱孙、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都见面交谈。在与他们深入交流后，费正清对战时知识分子仅能勉强糊口的贫困状况非常吃惊，并立即向美国进行了报告，认为他们正受到毁灭性的威胁，急需帮助。他写道“他们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坚持太久；可以想象这种局势在失望和贫困之中勇于面对现实，互相鼓舞，然而在思想和行动上却逐渐变得软弱。事实上，他们在这种处境下又坚持了三年。”^⑤1942年11月，他访问了中央研究院临时所在地李庄，拜访了之前熟悉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他在重庆仍然与知识分子有所交往，如与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就中美学术资料交流接触较多。^⑥1943年时，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还来拜访费正清，他对其评价说“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⑦中国知识分子是费正清在华最为了解的群体，费给予他们更深切的同情与理解。

① [美] 费正清著，黎鸣等译 《费正清自传》，第299页。

②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79页。

③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43页。

④ 邓鹏著 《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⑤ [美] 费正清著，黎鸣等译 《费正清自传》，第236页。

⑥ 参见王成志 《袁同礼、费正清与抗战时期中美学术文化交流》，《安徽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⑦ [美] 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71页。

费正清在重庆与文化人士也有所接触，如1943年，曾与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郭沫若、茅盾会面。他在1943年10月参加郭沫若50岁生日宴会，并称：郭先生穿梭在人群中，显得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依然年轻从容。生日宴会上，费还送了郭一些剃须刀片和磺胺类药物。^①同年10月，他与茅盾进行了一次座谈，并描述称：茅盾留着一撮小八字胡，个头矮小，看起来像个日本人。他很正派，但比较严肃，大概是当时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说如今每个人都在出版越来越多的翻译作品，因为它们容易通过审查。^②1943年11月，他拜访以开展教育事业闻名的陶行知，称“这个人从来不曾是个共产党员，但他希望启迪民众的心智，首先教他们认字，然而这样做，居然也被当局认为是邪恶。”^③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重庆还拜访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孙夫人十分坦率，她对于近期颁布的中国人没有护照不准乘坐军用飞机的规定表示极大的关注，表示当局不允许她离开重庆，即使在国内换个环境也不行，更不用说去国外了。^④费正清称宋庆龄同情左派，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笔者认为这一判断颇为准确。

在抗战时期，费正清与国民党官员陈立夫、孔祥熙、蒋廷黻、翁文灏、钱昌照、黄仁霖乃至宋美龄等都有交流。如1942年10月，他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称其为人和蔼可亲，并说明了竹子在中国的多方面用途。一年后他再次拜访陈立夫时，陈表示对美国的教育影片很感兴趣，也很喜欢卡通片，认为其可以表现比人类的肢体语言更为丰富的内容。^⑤1943年1月，费氏专程拜访孔祥熙，后来回忆称：孔与他坐在靠椅上，他向孔陈述他的经历、目前身份和工作任务。孔很精明，盯住他看了很久，似乎要判断他是否诚实。在细听他所说的一切之后，孔同意让他接触机密文件。^⑥1943年9月，他在重庆与宋美龄会面，但对宋印象不佳，称她极力想表现为一个伟大的夫人，谈话过分矫揉做作；她很像个演员，有许多可羨的长处，有吸引力，直觉反应很快，也聪明，但对弄虚作假地表演似乎有一种嗜好。^⑦此外，他当时还频繁出席一些官方活动，见到许多国民党官员，如参加重庆苏联大使馆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活动，他描述道：孙科博士过来，隔着桌子同他握手，特意对他说了一大堆话，表示次日要送他一件东西，但实际根本没有送来。孙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当时他正碰巧跟王世杰（另一位国民党部长）谈话，何应钦也隔着桌子同费握手问好。^⑧通过与这些国民党高层人员的交谈，费氏对国民党上层统治也可以有一定了解。

费正清对当时国民党内的要人物给予了评述。他称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几乎算是中国的二号人物，但张没有秘书处，无法获得很多国外信息。张并非位于一个组织严密的行政机器的顶端，不需要进行法律咨询，更没有定期的代表协商会议，因此也无法获得任何批评性建议。当各利益集团爆发冲突时，作为主席的张会出面进行协调，其他时候则完全任其发展。^⑨费正清因与中美合作所主持人梅乐斯有所接触，进而对与其合作的戴笠进行评价称：在战争时期，“戴笠”这个名字在中国也许是最令人恐惧的两个字。直截了当地说，蒋介石要监视、审查、逮捕、处决某个人，全由戴笠的组织去执行。戴笠是“暗杀”的天才，靠暗杀起家，成为蒋介石的特工

①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59页。

②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60页。

③ [美] 费正清著，黎鸣等译 《费正清自传》，第324页。

④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73页。

⑤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48—249页。

⑥ 参见 [美] 费正清著，赵复三译 《中国之行》，第49页。

⑦ 参见 [美] 费正清著，赵复三译 《中国之行》，第93页。

⑧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30页。

⑨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46页。

头子。^①他还对其他国民党重要官员描述称：孙科是蒋介石一个潜在对手，但并不具备与之相当的实力，蒋介石保证他在政府中的地位，部分是蒋介石要证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继承权的合法性（蒋认为他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何应钦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白崇禧是一位更有能力的军人，广西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王宠惠是一位革命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国际公认的法学家，自然是留美归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②笔者认为，这些叙述反映了各官员的真实情况。

费正清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评价最多，特别是对其所著《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批判。他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称：蒋介石既然是最高领袖，一旦国家主权在他手里丧失，他自然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然而只要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蒋介石实际上很少有能够左右全国局势的时候。他个人的顽固不知变通正表明整个政治传统的僵化。^③他认为蒋介石的思想杂糅中外，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称“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卫理公会惯常参加仪式的基督徒的虔诚，从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都被放进他那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④。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之际，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费正清曾对此书进行重点评述。1943年5月17日，他写了该书的读后感，称对其内容感到惊愕，并称他从未见过为了政治目的，竟会如此颠倒历史。这本书只是一本小册子，政治家写出这种小册子实在给人印象极坏。人们可以推测，该书不仅仅只在表达个人的偏见，更主要的还在于想给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歌功颂德。^⑤费正清认为该书是试图用古代道德与排外思潮来激励民族复兴，促进内部团结，但把中国苦难根源归咎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完全归罪于不平等条约，则有失偏颇。他对该书观点总结称：这本书首要观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外国侵略使中国蒙受耻辱、不平等条约罪恶滔天。由于西方国家侵害中国，中国才在现代化道路上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书中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恢复古代儒家道德伦理，使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国家。^⑥当时中共在内的许多群体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费正清则描述了学界对该书的不满“1943年5月，当我回到昆明后，我发觉《中国之命运》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的一种侮辱。自从蒋介石成为所谓的圣人和英雄后，此地学者们反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动。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学术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现在蒋介石公然侮辱了他们。”^⑦此外，蒋介石1943年还印行了仅限于官方阅读的《中国经济学说》一书。费正清对该书观点进行概括：蒋介石反对西方自由企业，声称西方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而是要利用儒家经典重建中国传统经济，还抨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那是提倡政府不去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蒋相信中国的政府不仅应该安排人民的生活，而且还应该控制和限制他们的需求。^⑧可以看出，费正清对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意见颇大。

① 参见[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第263页。

② 参见[美]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08页。

③ 参见[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28页。

④ 费正[美]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237页。

⑤ 参见[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第310页。

⑥ 参见[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费正清中国史》，第473页。

⑦ [美]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51页。

⑧ 参见[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237页。

因当时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公开活动，费正清结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他在重庆初次与周恩来见面，事后称“周恩来非凡的领导能力就使我深深叹服。他英俊帅气，眉毛浓密，智力超群，直觉敏锐。他代表着人民群众，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①他还认识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及其丈夫乔冠华，并对前者进行了长篇描写“她年轻活泼，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她既具有战地记者的老练，又具有令人喜爱的幽默感。她的勃勃生机在1943年沉闷、单调的重庆，就像一缕缕清新的空气。”^②他还与《大公报》女记者，实际为共产党员的杨刚有接触，并在回忆录中详细描写了她的经历。在与两位女士的对话和通信中，费正清发现：她们关注创新性的表述，同时也关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她们是马列主义者，忠于共产党并接受其领导。她们是中国的“传教士”，能够改变更多的人并使其加入到她们的队伍当中。^③费正清对重庆的共产党人评价极高，他在1943年9月写道“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般是极好的，因为这里的这群人是由燕京清华的大学生组成的，他们能说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思想。他们规范地学习，进行讨论和自我批评，并共同生活。”^④他将这些新朋友评价为道德英雄，还称这些人也是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产物，而如今则成为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并为之奋斗。年轻的左翼分子虽然不够强大，但是他们充满希望且足智多谋，也许有机会在未来有所发展。^⑤费正清在重庆与共产党人的密切交往，为其之后对中共的高度认可奠定了初步基础。

由上文看出，费正清在华接触的多是上层人物与知识分子，接触面也有不足。他曾反思称：“我并没有单独面对面地和普通民众接触，甚至也没有和学生有过太多的交谈。我在正式场合所结交认识的人都是官员和其他行政人员，交谈也必然是流于表面的。除去我个人的观察以外，我与朋友们共同的经历也间接地帮助我对事情作出基本的了解和评估。”^⑥这种局限也导致他的在华抗战观察并不全面，特别是不能反映底层社会的意见。

三 对国统区社会生活的描述

费正清1942—1943年在华期间，曾在昆明、重庆、成都等西南大后方活动，亲身体会西南社会生活，并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生动描述。1946年10月，他在为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所著《中国之怒吼》一书所写的书评中，对书中关于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及国统区民众悲惨生活描写也是感同身受，称该书关于战时中国生活分析深刻，特别是对战时重庆的描写、河南灾情的记载都是发人深省的。^⑦

费正清对中国人的特点也有所概括。1942年刚到中国时，他对中国人与印度人进行对比称：中国人精力旺盛，面带笑容，跟印度人的没精打彩、意志消沉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各处的妇女都像男子一样参加工作，像所有别的人一样自由自在地过着忙碌的生活；中国人的扁平方脸看上去比瘦削的印度人要强壮得多，气色也健康得多。^⑧1942年12月，他在给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的备忘录中则称“中国人会像日本人曾做过的一样接受我们的技术。然而，即使他们接受了现

①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67页。

② [美] 费正清著，黎鸣等译 《费正清自传》，第327页。

③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73页。

④ [加] 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等译 《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⑤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77页。

⑥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77页。

⑦ 参见 [美] 费正清著，满潮译 《从中国心脏发出的挑战》，《文萃》1947年第2卷第17期，第12页。

⑧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18页。

代科学，也不太可能和我们团结起来。这可能仅仅是为中国提供了反对我们的手段罢了。”^① 基于对中国人的认识，他在1943年还对未来的中国走势预判称“这个国家正在奋力使它自身现代化，然而它也可能更多继承历史上的坏处而不是继承历史上的美德，结果在我们有生之年里，它在世界事务中将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积极因素。”^② 正如其所料，这种局面在抗战结束后仍然继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彻底改观。

费正清在华期间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较多，形成了自己的特有认识。1942年9月，他写信称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支持而处于垂死挣扎的边缘，认为美国应该给与帮助，理由是这些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表达和教学的方式和费氏他们一样。他们也代表了美国在中国的切实利益。^③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他认为该群体多追求西方自由主义，但只是政府的辅助者，本身不能起领导作用。他在1943年9月的信中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中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类型的学者，是美国制度和科学标准的最佳典范，但他们仍然无法给中国带来什么活力……他们希望推动国家前进，但指不出具体方向。他们只是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自由教学的美好时光能够重新回来。而这也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了。”^④ 因为西南联大的教师虽然贫困但拒绝了美国官方的生活援助，费正清认为他们存在过分敏感的排外思想，称自己一年来努力想支援联大的教授们，但他们却将外国援助看作是外国干预，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形式，目的是使中国听任摆布。^⑤ 为此，费正清只能私下且秘密地救助了部分教授。不可否认，费正清仍然希望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教育模板而努力，而忽视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与国情。

费正清对国统区不同阶层进行了详细描述，认为他们整体状态是整日为生计忙碌，日渐消沉。对于国民政府的官员，他分析称“行政长官继承着清朝官员的传统，清朝官员除非环境所迫，其权力并不受到监督；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只有事发后，他才会受到审判。如今很多行政长官都是独裁者，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⑥ 对于政府的普通公务员，他则看到了其生计艰难，称这些“下江人”一旦随机关迁到住房拥挤、物资奇缺的战时四川，马上就遇到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飞涨的物价摧毁了政府薪水的购买力，公务员的生计等于在慢性自杀。^⑦ 他指出“知识分子和政府公务员以极高的爱国热情，忍受背井离乡之苦，放弃沿海城市生活的各种方便，学会在内地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不幸的是，虽然他们是现代中国主要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希望却落了空。这是因为政府的无能，也是因为环境太落后之故。”^⑧ 他曾在1942年11月到过四川合江，描述该地底层民众情状：新旧事物杂陈又是另一番令人迷惑的景象。一个正在进行道教葬礼仪式的出殡队伍，主持的道士戴着软呢帽，然后路过一座由三民主义青年团新建的尖顶方塔，上面还刷着标语。一位算命先生，带着眼镜，用晃眼的乙炔灯招揽着顾客，还配有一个招牌写着“直言不讳，勿怒顺命”。^⑨ 对于中国庞大的农民阶层，他则称：

①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35页。

② [美] 费正清著，赵复三译 《中国之行》，第83页。

③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198页。

④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57页。

⑤ 参见 [美] 费正清著，赵复三译 《中国之行》，第138页。

⑥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55页。

⑦ 参见 [美] 费正清著，张沛等译 《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25页。

⑧ [美]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225页。

⑨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27页。

“四川的农民通常都过着富足的生活，而河南的农民却处于饥饿的边缘。但在我狭窄的视野内，政治斗争并没有涉及他们，而是仅限于统治阶层内。”^①当然对底层社会群体，费正清的观察仍是停留于表面，其认识远没有对上流社会那般深刻。

抗战期间，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贬值，费正清对此也有体验。他1942年9月到昆明时曾描述称“一种吉士牌香烟每包售价10元，一支派克自来水笔售价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而投机买卖正是伴随着为了实利而积聚过多财富的必然产物。因此，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②他认为国民政府对通货膨胀似乎束手无策，虽曾通过颁布法令来稳定肉价，但并不起作用。他为此分析称：国民党不像共产党那样住在农村，而是生活在钞票印刷机旁边。这种短视的应急办法造成的通货膨胀，一步一步耗尽了财力，使所有上层人士意志消沉。^③他对知识分子因此受到的影响则指出“显然，除陪都政府的低级官员外，那些受过现代教育又无家可归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战时通货膨胀的特别受害者。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却忍受着比普通人更多的压榨和痛苦。”^④普通民众战时遭受的通货膨胀影响其实更为严重，但费正清因未接触而甚少提及。

对于重庆、成都等他曾生活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费正清也有记述。对于四川省，他描述道：四川省除了陪都重庆周围的水浇稻田外，大部分是高山和激流，气候潮湿得令人极不愉快。没有暖气设备的地方，冬天很冷，夏天极热。^⑤对于居住时间较久的重庆，他则称“重庆就像一个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川江上的号子声，苦力们背着石头或水攀援在无止尽的石台阶上发出的哼哼声，小贩们背着货物沿街的叫卖声，汇合在一起，从远处听，就像一阵阵不停的骚乱。当然，在我眼前的是一片遭受轰炸和燃烧过的废墟，只是重建了一些简陋的棚屋，看不到一丝色彩。”^⑥1943年2月他在成都写道“很难理解在这片土地上有这么众多的平民，而在平民和地方乡绅之上，统治阶级中人是那么地稀少。农民和乡绅是中国旧时代的遗留物，而新时代的人只占极少数，仅仅像面包皮那样的薄薄的一层，过着全盘现代化的生活。”^⑦此种情况实际在战时中国的其他地区也都普遍存在，反映出较大的阶层差距。

总之，费正清不仅在自己回忆录中大量描写战时国统区生活，还根据亲身体会在其研究著作中给予评论。他从外国人的视角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统治表达了强烈不满，对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的艰苦生活给予了深切同情。而且不同于在华记者、外交官的观察，费正清从历史学者视角对国统区进行深刻解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政治观察。当然其评判的出发点仍然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他通过在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一年多的亲身经历，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员、知识分子及共产党人，形成了对国民政府的不佳印象，对共产党的好感却在增加，进而影响了其后对国共问题的态度，而且其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本文责编：周全

①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77页。

② [美] 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1页。

③ 参见 [美]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227页。

④ [美] 费正清著，闫亚婷、熊文霞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29页。

⑤ 参见 [美]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226页。

⑥ 参见 [美] 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第297页。

⑦ [美] 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89页。

war and expats to gather in designated areas for collective education and repatriation. From January to April of 1946 , Taiwan repatriated nearly 170 ,000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and more than 290 ,000 Japanese expats. Conscript and remaining Japanese expats were repatriated in four batches from August 1946 to December 1948 under strong objections from Taiwanese compatriots. Taiwan’s repatriation of those Japanese was not only part of China’s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expats and prisoners of war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then complicated situations both on the island 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particular , the Taiwanese compatriot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Japanese expats and prisoners of war and their colonial rule , are still worthy of reflection by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nvisible Symbols: The Planned 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Martyrs’ Shrin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 Hailiang (104)

Martyrs’ shrine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re erect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for commemorating the martyrs to the War and mobilizing the people. As the topmost memorial , the Capital Martyrs’ Shrine w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four-level temple sacrifice system.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s planning of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Capital Martyr’s Shrine , were not only intended to display the state’s veneration of the martyrs and to shap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society , but also intensely purposed to highlight a significantl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ght”. Yet in the process of the Shrine’s site selection , survey , and handover ,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confronted with objections and resistance from both worshiper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oes Guan Yu and Yue Fei and local interest groups. Further obstructed by the inflation of prices and lack of funds , the construction plan was finally aborted. Despite all this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Martyr’s Shrine as a symbol invisibly created an image of “common national heroes” transcending places of birth ,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martyrs’ symbols creat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o be proliferated throughout all levels and to multiple directions , and for memor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be reinforced.

John K. Fairbank’s Observations of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Deming (115)

John K. Fairbank once worked in China and had rich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his later memoir and writings , he offered in-dept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He criticized the Kuomintang’s political ,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during the War , and expressed discontent over the various maladies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He had extensive contacts with Kuomintang officials , intellectuals ,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 whom he evaluated differently. In particular , he denounced Chiang Kai-shek and his *China’s Destiny*. He also described the social life in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 and depicted the circumstances of various social classes. John K. Fairbank’s observations of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basically reflected the tru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 and influenced his later opinions about the dispute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